

高品质生活的理论意涵、指标体系及省际测度研究

雷晓康, 张琇岩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 解读高品质生活不能脱离对美好生活、生活质量、幸福生活等相关概念的认知,更不能脱离共同富裕这一发展主基调。高品质生活的建设应适应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是公民所拥有的一种收入、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客观条件得到更充分保障,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等主观感受更为满意的动态化生活状态。在归纳总结国内外相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公民的需求角度出发,以“五位一体”总布局为领域划分标准,将高品质生活测度指标分为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体教育、社会生活以及生态环境等 5 项一级指标、18 项二级指标以及 49 项三级指标,并最终形成“高品质生活指数”,涵盖了客观现实与主观感受。采用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完成指标权重的赋值计算。通过对我国 28 个省份及全国平均水平的高品质生活现状进行评估,发现高品质生活建设较为先进的地区仍集中在东部地区,尤其在经济生活领域最为突出。其中,排名靠前的东部省份主要由两类情况组成:一类是以浙江为突出代表的由各领域的均衡发展带来整体高品质生活建设的进步;另一类是以广东为突出代表的由部分领域长板效应所带来的整体水准提升。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高品质生活建设发展参差不齐,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建设仍存在一定差异。

关键词: 高品质生活; 高品质生活指标体系;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D6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454(2023)02-0100-14

引用格式: 雷晓康,张琇岩. 高品质生活的理论意涵、指标体系及省际测度研究[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3, 36(2):100-113.

Citation Form: LEI XIAO-KANG, ZHANG XIU-YAN.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meaning, index system and inter provincial measurement of high-quality life [J]. 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3, 36(2):100-113.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体量一跃而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当下,中国也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财富的累积,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20 年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当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和多样^[1]。2018 年 3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高品质生活”概念,强调“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2]。可以说,从物质文化生活迈向高品质生活,是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从量到质的跨越^[3],正如 2021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的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的,高品质生活建设方向与最终目标是“适应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4]。如果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

收稿日期: 2022-04-04; **修回日期:** 2022-09-10

基金项目: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重点智库研究项目“数字赋能政府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及实现路径研究”(2021ZD1048); 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 2021 年课题“构建陕西省高品质生活体系研究”

作者简介: 雷晓康(1971-),男,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与社会治理;张琇岩(1998-),女,山西运城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与养老服务。

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所交出的优异答卷,那么创造高品质生活则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建设的应有之义。它不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而且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建设涉及社会民生的各个领域,凝聚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彰显着共同富裕的本质情怀。

当前学术界对于高品质生活的讨论更多停留在理论解析维度,视角聚焦政策层面,注重从大处着眼描绘高品质生活的图貌,对现实发展的测度体系较少,尤其是全国性截面数据亟待补充。如果对高品质生活建设的挖掘始终停留在学理探讨上,不免有些雾里看花之感。高品质生活同美好生活一样,是中国语境下对预期理想化生活的一种构建。如何将思维层面的认知落地,使得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政策路径看得见、摸得着,就需要从理论回归实际,围绕高品质生活是什么、如何衡量这一逻辑主线。本文通过将微观主体的生活需求同国家宏观的战略导向相结合,建立高品质生活测度指标体系并对全国 28 个省份及全国平均水平进行评估,通过对比不同地区的发展经验,拟对高品质生活这一新时代主题进行更完整的学理阐释与现实把握。

二、高品质生活的理论意涵

(一) 高品质生活的学科视野

一提起高品质生活,不可避免地就会提及美好生活、生活质量、幸福生活等相关概念,如果单从心理学的视角来解读高品质生活,更多锚定在人的主观幸福感与社会交互中,虽更贴切个人的现实境遇,但视角太过微观,无法充分体现出高品质生活面向全体人民普遍享有的战略定位。因为高品质生活更多强调的是整体生活的发展,而仅非一种心理状态。如果单从传统经济学角度出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便转化成物质化的效用主义。物质财富的最大化成为个人发展的终极目标,可是财富的累积一定会带来幸福度的持续提升吗?心理学家布利克曼(Philip Brickman)和坎贝尔(Donald Campbell)在 1971 年发表的论文《享乐相对主义和规划美好的社会》中便指出更好的客观条件对个人福利没有影响^[5],从而引发了经济学界对于“幸福悖论”的讨论。1974 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 Easterlin)在《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人类:一些实证证据》中进一步提出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内,幸福水平与收入水平呈现一定正相关,然而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却没有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6]。伊斯特林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得到让人满意的生活并不全靠财富,更多的财富并不会带来更大的幸福。因此对高品质生活的讨论不能仅局限于单一的学科视角,应充分整合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研究,将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同微观个人发展相融合。

高品质生活意味着人民更满意的生活,正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所阐释的那样,人的幸福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其中物质幸福是必须满足的基础^[7],而“现实的个人”的幸福就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8]。2012 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影响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因素进一步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幸福观。

(二) 高品质生活的概念界定

讨论高品质生活的概念,主要从其内涵与外延两部分出发。内涵更多关注的是对高品质生活的科学定义,而外延则更强调对高品质生活的具体分类。

1. 高品质生活的内涵

国外学者关于高品质生活的研究起步较早,高品质生活更多是指对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的衡量,从医学领域的生存观逐步拓展到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观。多数学者认为,“生活质量”一词真正成为学术用语是由美国经济学者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于 1958 年在《富裕社会》一书中提出的,正如书中所写“同生产量相比,探询生活质量已不再罕见”,生活质量不仅包含经济生产,更涉及社会平等、环境质量、精神富足等方面^[9]。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学者的研究内容转向了更宽广的领域,并逐渐指标化,强调政府及学术界不应只关注经济的发展,而要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发展的系统。1966 年,鲍尔(R. A. Bauer)在其《社会指标》论文集中首次提出“社会指标”的概念,并将生活质量作为社会发展的指标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10]。1971 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在其著作《政治和增长阶段》中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级阶段(即第六阶段)是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包括在环境、教育、交通、公共服务、社会公平等方

面的追求^[11]。1976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坎贝尔(Donald Thomas Campbell)等通过测量个人对幸福的感知情况,进而观测其生活质量状况^[12]。

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的研究逐渐传入国内,并开始受到政府及学术界的重视。1985年,林南等在天津开展了千户居民生活质量调查,被视为国内有影响的生活质量调查之肇始^[13]。就研究层次的发展而言,可分为生活质量研究阶段、生活品质研究阶段以及高品质生活研究阶段^[14]。关于高品质生活的定义,邓嵘较早地从艺术设计的角度将其定义为建立在经济、文化、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社会生产、生活条件和手段丰富的前提下,人们对健康、精致、休闲的生活以及情感生活等唯美生活状态的追求^[15]。大部分学者更多是从民生视角出发,将其与美好生活联系在一起。例如,姚树洁指出,高品质生活就是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的美好需要得到更好保障和满足的生活^[16]。石凤珍等将高品质生活定义为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并持续下去的生活,即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精神生活更为充盈的生活^[17]。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将其定义为一种在当下能感受到充实、有保障、可持续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生活状态^[18]。高品质生活的本质旨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19]。它的内涵是全面的也是具体的,涵盖了高质量的物质生活与高品位的精神生活^[20]。它既是基于“社会民生改善”或“提高生活水平”概念的延伸与拓展,又是一个伴随着时代变迁和观念更新不断变化的开放概念^[21]。可以说它不仅符合人的需求不断升级的发展规律,也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更是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动力^[22]。

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于高品质生活的定义研究,不难看出学者们的理解逐步从单一的客观状态或主观感受发展为二者的结合,强调人和社会的同步发展。在总结上述研究观点的基础上,本文将高品质生活进一步定义为公民所拥有的一种收入、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客观条件得到更充分保障,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等主观感受更为满意的动态化生活状态。需要强调的是高品质的生活水平应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匹配,它不仅是对过去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完善,更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全面化、智能化、差异化等特点。全面化是指高品质生活不应只包含客观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关注到人的全面发展与成长;智能化指的是未来的高品质生活建设应充分适应数字化发展,使人民充分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差异化是指人们受到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对高品质生活的感受不完全相同^[23]。

2. 高品质生活的外延

关于高品质生活的分类,主要包含两个维度上的认识:一是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出发,将人的需求层次分为生存型、普惠型、发展型。高品质生活的建设侧重的是人更高层次的需求,但也离不开对基础生存条件的巩固,缺少生存条件根基的高品质生活如同空中楼阁般难以触摸。更进一步讲,高品质生活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应当涵盖社会上的所有人群,但在现实中不同群体所处的需求阶段不同,这就要求高品质生活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层次划分。二是从人的需求种类出发,根据“五位一体”指导思想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五大领域的高品质生活。2010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Joseph E. Stiglitz)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团队牵头撰写的《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中分析了GDP增长对反映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的局限性,并提出了生活品质观测方式多维度的改革建议,除去物质生活外,还包括主观感受以及健康、教育、个人活动、环境状况等在内的其他因素^[24]。

综上所述,本文将高品质生活具体划分为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体教育、社会生活以及生态环境等五大模块,涵盖了可能影响个人生活状态与发展的各种客观因素与主观感受。

3. 高品质生活与共同富裕

对高品质生活的讨论不能脱离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因为高品质生活与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兼具过程与结果的统一,都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但二者的范围与侧重点不尽相同。当前学术界对共同富裕的解读多从社会财富的积累分配与社会生活的提质扩容两方面入手,从更宏观的国家战略视角切入,对整体协调发展做出全面研判,主要落脚于经济领域^[25-26],认为共同富裕是发展生产力与完善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27]。高品质生活则更侧重从民生视角出发,围绕如何实现公民的美好生活需求这一主题展开,尽管所涵盖的内容也较为系统庞杂,但视角相对微观,可以说共同富裕的概念范围是大于高品质生活的。从发展关系来看,创造人民满意的高品质生活是共同富裕目标是否实现的重

要权衡,二者都以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保障,以现代化国家高效治理为关键支撑。从发展阶段来看,均具有分阶段推进的特点,但由于公众对高品质生活的建设感知是动态化调整的,使得高品质生活的结果阶段较为模糊,更多停留在发展过程之中,而共同富裕自身所带有的政治属性使得其更侧重结果的实现。

(三) 高品质生活的定位把握

从公民的现实需求出发,美好生活不仅意味着更高品质的生活,也意味着更深层次的民生福祉。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并用“八个更”概述了高品质生活的基本面,即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把民生事业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对民生工作提出新要求,即做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目标要求,强调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规划明确提出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抚幼、就业、文体、助残等重点领域,推动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体系,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建设高品质生活先行区,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更加协调,构建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协调共进、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优化互促的良性循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样化的生活需求。

从国家层面来看,实现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逐渐成为民生工作的政策重心,一改过去仅以收入增长作为唯一导向的片面发展目标,着重强调社会的全面进步,政策内容涵盖教育、就业、收入、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居住条件、安全、环境、精神文化、助残、社会治理、应急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强调关注本国群众的现实需求,即尊重中华文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品质生活,并成为可供世界借鉴的中国样本。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品质生活强调的不是个人享乐主义,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状态,只有全社会各类群体都充分享有更高品质的生活,才能真正叫作全民共享的高品质生活,但同时也应承认差异性的存在,因为不同群体对生活品质的感知必然不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客观条件的约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在建设民生事业,实现高品质生活的道路上,“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既要把握建设机遇,又要增强风险意识,认清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所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现状,给予人民合理的想象与预期。这就要求创造高品质生活不能仅停留在一句口号之上,必须要有参考比照,通过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对现实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而为高品质生活的建设道路提供统计支撑。

三、高品质生活测度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估

(一) 高品质生活测度指标体系研究现状

1. 国外有关高品质生活的评价指标体系

国外有关高品质生活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选取指标的性质不同分为客观指标体系、主观指标体系以及客观—主观指标体系。其具体内容详见表1。

“人类发展指数(HDI)”主要由三个指标构成: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教育获得即成人识字率(2/3权重)与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1/3权重)合并计算结果和人均GDP的对数,这三个指标分别反映了人的长寿水平、知识水平和生活水平,是一类客观指标体系。“美好生活指数(BLI)”包括住房条件、家庭收入、工作、教育、环境、公民参与、健康等11个方面。“快乐星球指数(HPI)”综合考虑了生活满意度、平均寿命和环境承受能力(包括全国人口生活空间和能源消耗能量)等多项指标,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则不在考虑之列,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经济社会发达程度并不是民众感觉快乐的首要因素。“社会进步指数(SPI)”是由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R. J. Estes 教授在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的要求和支持下于 1984 年提出的,涉及 3 个层级、12 个社会经济领域的 54 项指标。“德国创造品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评价品质生活的 3 个部分、12 个维度和 48 项主客观指标。第一部分为“我们的生活”,主要反映民众品质生活的直接状况,涉及 5 个维度 23 项指标。第二部分为“我们的环境”,主要反映与民众品质生活息息相关的个人和社会环境,涉及 3 个维度 11 项指标。第三部分为“我们的国家”,主要反映构成民众品质生活重要保障的外部大环境,涉及 4 个维度 14 项指标。除此以外,还有美国海外发展委员会提出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世界卫生组织生活品质工作组(WHO-QOL Group)制定的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等多项指标体系。通过分析国外现有的指标体系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创造品质生活评价领域呈现“超越 GDP”的改革探索趋势^[15],既涉及客观物质因素,又包含了人民可以进行个体判断的主观感受。

表 1 国外有关机构高品质生活测度指标体系比较

指数/指标体系名称	人类发展指数(HDI)	美好生活指数(BLI) ^[28]	快乐星球指数(HPI)	社会进步指数(SPI) ^[29]	德国创造品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 ^[30]
主办单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英国独立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F)	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	德国联邦政府
起始年份	1990	2011	—	2012	2016
目的	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对 34 个成员国家的幸福感作出评估	衡量国民快乐程度	测量社会及环境进步与改善情形	衡量德国品质生活的建设
范围(一级指标)	长寿水平、知识水平、生活水平	生活质量、物质条件	生活满意度、平均寿命和环境承受能力	基本人类需求、社会福利、机会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国家
领域划分(二级指标)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教育获得即成人识字率与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合并计算结果、人均 GDP 的对数	健康状况、工作生活平衡、教育与能力、社会联结、公共参与及治理、环境质量、个人安全、主观幸福感、收入与财富、工作与报酬、住房	—	营养与基本医疗照护、水与环境卫生、居住品质、人身安全、基础教育普及率、资讯与通信普及率、健康与保障、永续发展程度、个人权利、个人的自由与选择、社会包容度、高等教育普及率	健康生活、好工作与公平分享、教育机会均等、兼顾事业与家庭的时间、稳定收入、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城乡安居、安全与自由生活、承担全球责任与保障和平、自由与平等生活、自然环境保护、增强经济实力与增加未来投资
指标数(三级指标)	4(二级指标数)	24	—	54	48
是否观测主观感受	否	是	是	是	是

注:作者根据资料自绘。

2. 国内关于高品质生活的评价指标体系

随着指标运动在国内的兴起,各类研究院、课题组通过研究与总结国内外民生、幸福度等相关理论与实践成果,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制定出一系列标准不同的高品质生活指标体系,以下仅选取两组较为权威的指标体系进行介绍,详见表 2。

表 2 国内有关机构高品质生活测度指标体系比较

指数/指标体系名称	中国民生发展指数(3.0) ^[31]	中国民生指数 ^[32]
主办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生发展研究”课题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
起始年份	2011	2013
目的	测度中国民生发展状况、监测中国民生发展进展	反映各省份民生发展水平和改善状况
范围(一级指标)	民生发展	民生客观指数、民生主观指数
领域划分(二级指标)	民生基础、收入消费、居住出行、文化教育、安全健康	(客观指标)居民生活、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生态文明 (主观指标)生活满意度指数、民生整体满意度指数
指标数(三级指标)	25	45(客观指标)
是否观测主观感受	否	是

注:作者根据资料自绘。

“中国民生发展指数”包括民生基础、收入消费、居住出行、文化教育、安全健康等五大领域,以测度中国

民生发展状况、监测中国民生发展进程,目前已更新至“中国民生发展指数 3.0 版”。“中国民生指数”主要由民生客观指数和民生主观(满意度)指数构成。民生主观指数又包括生活满意度指数和民生整体满意度指数。对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包含对当前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对近 1 年中生活改善情况满意度的评价、对未来信心的评价三项,而民生整体满意度指数是反映城乡居民对 12 个民生项目的整体评价,包括:交通状况、社会治安、住房状况、食品安全、政府行政效率、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就业质量和利益表达诉求。民生客观指数又包括水平指数和改进指数,分别反映各省份民生发展水平和改善状况。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组提出的由 39 个指标加权平均得出的“社会发展综合指标”、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提出的由 10 项指标加权平均得出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综合指标(SEDI)”等指标体系。

综合国内外现有指标体系研究可以看出,在结构上,现有大多数的指标体系最终都综合成了一个单一指数,既直观表达了测量结果,又方便进行比较,但这种单一的指数仅适用于研究整体发展水平,无法反映领域间的发展细则;在内容上,开始探索个人主观感受在社会民生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以及测量的必要性,摆脱过去单一地追求经济发展效率,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指标数相应增加;在评价标准上,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分数标准,而是更倾向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排列顺序的高低代表了发展水平的强弱。越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指标体系,其指标内容更属个性化定制,数据获取难度也较大,有利于对本地区进行深刻评估而不利更大范围内的横向对比。

(二) 高品质生活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1. 高品质生活测度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本文充分参考上述国内外较为权威的指标体系构建经验,同时对比了统计年鉴指标以及不同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公民的生活需求角度出发,以“五位一体”总布局为领域划分标准,通过指标间的相关性分析,删除了具有相关性的重复指标,最终形成了包含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体教育、社会生活以及生态环境等 5 项一级指标、18 项二级指标以及 49 项三级指标在内的“高品质生活测度指标体系”(见表 3)。指标的权重赋值采用专家打分法与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并通过 Yaahp 软件辅助完成计算,指标体系的最终权重值为 9 名专家(包括 7 名公共管理领域专家、1 名经济学专家、1 名社会学专家)赋值的算术平均值,所有专家的判断矩阵均通过一致性检验。图 1 是高品质生活测度体系的一级、二级指标结构模型图,由于二级、三级指标层级结构模型图需另单独构造,在此不进行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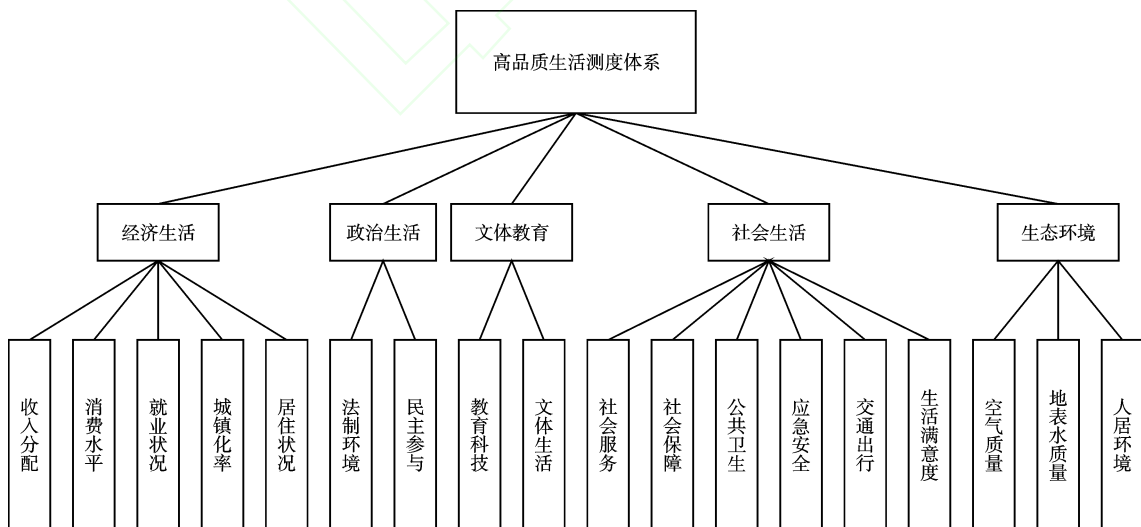


图 1 高品质生活测度指标体系一级、二级指标层次结构模型图

就经济生活而言,收入是民生之源,也是个人立足于社会生存的根本保障,高质量的经济生活助推着高品质的生活建设,因此高品质生活测度指标体系首先应当关注公民的经济生活。由于高品质生活具有共享特征,因此不仅对个人的消费能力提出保障要求,而且注重财富分配的公平效应。根据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表 3 高品质生活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单位	权重	类型
经济生活指标	39.42%	收入分配	30.34%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人均 GDP 增长率	%	63.52%	+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36.48%	—
		消费水平	11.39%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100%	+
				就业状况	21.02%	城镇调查失业率	%
		城镇化率	15.85%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100%	+
				居住状况	21.40%	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m ²
政治生活指标	14.34%	法制环境	66.00%	每千人拥有律师数	人/千人	44.73%	+
				每千人拥有公证人员数	人/千人	23.97%	+
				每千人拥有调解人员数	人/千人	31.29%	+
		民主参与	34.00%	最新一届人大代表中女性占比	%	47.59%	+
				每千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机构数	个/千人	52.41%	+
				文体教育指标	16.38%	教育科技	68.05%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	17.52%	+				
每千人拥有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	人/千人	17.08%	+				
文体生活	31.95%	教育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	%			23.94%	+
		每千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千人			13.93%	+
		每千人拥有公共图书馆数量	个/千人			29.30%	+
社会生活指标	15.09%	社会保障	23.92%	每千人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站)数量	个/千人	18.24%	+
				每千人拥有的艺术表演团体数量	个/千人	13.49%	+
				每千人拥有博物馆数	个/千人	19.45%	+
		社会服务	13.40%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m ²	19.51%	+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平均水平/城镇人均消费支出	%	34.06%	+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平均水平/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23.52%	+
公共卫生健康	22.30%	重大疾病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率	%	18.74%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	%	23.68%	+		
		每千人拥有养老服务床位数	张/千人	61.41%	+		
		每千人拥有的注册志愿者数	人/千人	17.20%	+		
		每千人拥有的持证社会工作者数	人/千人	21.38%	+		
		地区平均寿命	岁	28.78%	+		
应急安全	10.78%	每千人拥有的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千人	26.57%	+		
		每千人拥有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数	个/千人	18.56%	+		
		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千人	26.11%	+		
		每千人交通死亡人数	人/千人	56.48%	—		
		每千人火灾死亡人数	人/千人	43.52%	—		
		每千人拥有民用汽车数	辆/千人	23.07%	+		
交通出行	13.71%	交通拥挤度	—	19.44%	—		
		建制村班车通达率	%	14.64%	+		
		每千人享有公路里程	里/千人	13.47%	+		
		每千人拥有地铁里程	里/千人	15.25%	+		
		每千人拥有的公共交通工具数	辆/千人	14.13%	+		
		生活满意度	15.88%	对当前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评价	—	43.98%	+
生态环境指标	14.77%	空气质量	43.79%	对“15 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满意度	—	23.62%	+
				对未来的信心	—	32.41%	+
		地表水质量	29.26%	全年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	%	64.81%	+
				可吸入细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值	微克/立方米	35.19%	—
		人居环境	26.95%	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	%	69.63%	+
				劣Ⅴ类水体比例	%	30.37%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39.81%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60.19%	+				

社会生产劳动是任何时代人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33],而在现代社会,劳动的质量更多体现在就业保障之上,并以城市化发展为依托。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2 年全国一季度经济数据可以看出,尽管在经济增速较缓的后疫情时代,人均居住消费支出仍占到总人均消费的 22.5%,足以证明住房对于公民经济生活的影响。2021 年 8 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表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强调了房屋的保障性居住属性。可以说人民的高品质经济生活是一种分配更加公平、消费更有能力、居住更加舒适、就业更有提升、城市化进程更快的生活状态。

就政治生活而言,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法治建设与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成为国家政治文明进程的重要变量,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是否具有公平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以及政治法制环境建设的好坏也标志着高品质生活的优劣,人民的高品质政治生活是一种法制环境更加完备、民主公平更有保障的生活状态。

就文体教育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愈发受到关注,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教育公平不仅能缩小收入差距、帮扶弱势群体,而且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社会的基础性公平之一^[34],尤其是对于个人而言,教育是对个体人力资本的有效投资,同时随着科技的持续发展,也极大重塑了现有社会格局,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精神层面的满足属于人类更高层次的需求,不仅包含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且突出表现为对文化素养和精神世界的不断追求。因此,人民的高品质文体教育应当是一种教育科技更加先进、文体生活更加充沛的生活状态。

就社会生活而言,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备是衡量一个地区民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指标,而公共服务体系更是由多主体参与多方位供给组成。其中,社会保障为公民提供了必要的风险支撑,社会服务为公民提供了多样化的市民生活,公共卫生保障着人民群众的生存质量,应急安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安全保证,交通出行扩大了公众的活动范围,而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应积极接受群众的监督与反馈,通过公众的满意度来体现。这就表明人民高品质的社会生活应是一种社会保障更有质量、社会服务更加全面、公共卫生质量不断提升、应急机制更加高效、交通出行更加便利、生活满意度持续提升的生活状态。

就生态环境而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能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能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是实现高品质生活的重要保障。其中,大气环境与水环境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可以说是最核心的要素。除了自然环境外,人居环境也同样影响着生活质量的高低,尤其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人民群众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逐步提升。可以说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是一种生态条件更加宜居、人居环境更加舒适的生活状态。

2. 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了消除指标之间的量纲影响,需要进行数据标准化(归一化)处理,以解决数据指标之间的可比性。本文采取取差标准化的方式,即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化,使结果映射到 $[0,1]$ 之间,具体处理方式如下:

三级正向(+)指标标准化处理方式:

$$Y_j = \frac{x_j - \min(x_j)}{\max(x_j) - \min(x_j)}, j = 1, 2, \dots, 49 \quad (1)$$

三级负向(-)指标标准化处理方式:

$$Y_j = \frac{\max(x_j) - x_j}{\max(x_j) - \min(x_j)}, j = 1, 2, \dots, 49 \quad (2)$$

式中, $\max(x_j)$ 为样本数据的最大值; $\min(x_j)$ 为样本数据的最小值; x_j 为某城市第 j 项三级指标,根据三级指标总个数可得 j 的取值范围 $1 \sim 49$; Y_j 为第 j 项三级指标的标准化值。

3. 高品质生活指数(HLI, High-quality Life Index)计算公式

二级指标、一级指标的分值计算公式如下:

$$Z_i = \sum_{j=1}^{49} Y_j \times \omega_j, i = 1, 2, \dots, 18 \quad (3)$$

$$Q_q = \sum_{i=1}^{18} Z_i \times w_i, q = 1, 2, 3, 4, 5 \quad (4)$$

式(3)为二级指标分值的计算公式,其中, Z_i 为第*i*项二级指标的分值,根据二级指标总个数可得*i*的取值范围1~18; w_j 为第*j*项三级指标的权重,*j*的取值范围同上。式(4)为一级指标分值的计算公式,其中, Q_q 为第*q*项一级指标的分值,根据一级指标总个数可得*q*的取值范围1~5; w_i 为第*i*项二级指标的权重。

基于此,高品质生活指数(HLI)计算公式如下:

$$HLI = \sum_{q=1}^5 Q_q \times w_q \quad (5)$$

式(5)中,HLI为最终计算出的高品质生活指数, w_q 为第*q*项一级指标的权重,*q*的取值范围同上。

(三)不同省际间高品质生活建设现状评估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收集的数据多为2019年、2020年的统计性截面数据,部分未能找到的数据选取了相似数据(近似年份、全国平均数据或同类指标数据)进行替代,每千人口所使用的常住人口数据也随年份的变化而更改。例如,某省2019年的某数据缺失,采用2018年的数据替代,同理每千人口使用的也是2018年该地的常住人口。一般而言数据替代的顺序是:首先倾向前1~2年的数据,若仍缺失则选取后1~2年数据,若仍缺失则采用全国均值替代。由于主观数据的约束,仅对全国28个省份进行评估对比,海南、新疆、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不包含在评估范围内。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各省份统计局网站,以及相关部门机构公开发布的数据。其中,每千人口采用的是年末常住人口数量,部分三级指标的数据内涵为:由于城镇调查失业率缺失,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替代;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包括研究生、普通本专科生、成人专科生、网络本专科生等;社区卫生服务站数量包括城镇社区卫生服务站与农村卫生室;交通拥挤度用百度地图发布通勤高峰拥堵指数来替代。由于主观评分数据较难获取,本文二级指标生活满意度的数据分别来源于2015年、2017年的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其中三级指标“对当前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数据来源于2017年问卷C33^①;三级指标“对‘15分钟便民服务圈’建设的满意度”数据来源于2015年问卷B17的四项满意度^②均值,全国性数据主要由数据库所包含的28个省份的全部数据组成;三级指标“对未来的信心”数据来源于2017年问卷D38的第3题^③。

2. 评估结果

基于前文构建的高品质生活测度指标体系和指数计算方法,对包括北京、广东、浙江、上海在内的28个省份高品质生活指数进行评价,同时引入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对比参考,2019年、2020年不同省份高品质生活指数排序情况见表4。根据表4可以看出,在这28个省份及全国平均水平中,2019年高品质生活指数排名前五位的省份分别为浙江、福建、北京、广东、上海,均属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排名第二十二;排名后三位的省份分别为山西、贵州、云南,隶属于中西部地区。相较而言,2020年高品质生活指数排名略有差异,前五位的省份分别为浙江、江苏、北京、福建、广东,仍由东部地区占据榜首;全国平均水平排名第二十二;排在后三位的省份为辽宁、山西、贵州,分别属于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两年排名总体上稍有变化,但前六名省份基本未变,仅出现了这六个东部地区内部排名的变化,而浙江也是连续两年位居榜首。从下文的数据来看,浙江在各领域发展并未均占据榜首,从侧面也反映出浙江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全面性与高质量性,为选取浙江作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了数据解读。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未有省份进入前六位,尤其是中部地区的山西、西部地区的四川、内蒙古、云南、贵州以及东北地区的黑龙江连续两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足以证明东部地区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发展的差异性较大。就均值而言,全国平均水平稳步提升,说明全国的

① 问卷C33:总的来说,您对自己现在整体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是:完全不满意(1)、非常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无所谓满意不满意(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6)、完全满意(7)。

② 问卷B17:综合考虑各个方面,您对我国目前公共服务总体上的满意程度是:非常不满意(1)、不太满意(2)、说不清满意不满意(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其中各个方面具体包括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获取公共服务的便利程度、公共服务的普惠性程度。

③ 问卷D38第3题:您对未来是否持乐观态度: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无所谓同意不同意(3)、同意(4)、非常同意(5)。

高品质生活建设在持续向上发展。

表 4 2019 年、2020 年不同省份高品质生活指数排序表

排序	2019 年			2020 年		
	地区	省份	高品质生活指数	地区	省份	高品质生活指数
1	东	浙江	0.5738	东	浙江	0.6285
2		福建	0.5475		江苏	0.5714
3		北京	0.5448		北京	0.5645
4		广东	0.5419		福建	0.5369
5		上海	0.5251		广东	0.5253
6		江苏	0.5091		上海	0.5248
7	中	江西	0.4768	中	江西	0.4881
8		湖南	0.4749	西	陕西	0.4617
9	西	青海	0.4631		青海	0.4614
10		重庆	0.4299	中	湖南	0.4409
11		陕西	0.4256		安徽	0.4290
12	东	山东	0.4234		湖北	0.4280
13	西	广西	0.4190	西	广西	0.4213
14	中	安徽	0.4175	东	天津	0.4188
15	西	宁夏	0.4163	西	宁夏	0.4039
16	东北	辽宁	0.4137	中	河南	0.3992
17		吉林	0.4130	西	重庆	0.3982
18	中	湖北	0.4101	东	山东	0.3947
19	东	天津	0.4010	西	甘肃	0.3936
20		河北	0.3981	—	全国	0.3916
21	西	甘肃	0.3970	西	四川	0.3915
22	—	全国	0.3717		云南	0.3859
23	西	四川	0.3677	东北	黑龙江	0.3814
24	东北	黑龙江	0.3673	西	内蒙古	0.3761
25	西	内蒙古	0.3655	东北	吉林	0.3738
26	中	河南	0.3654	东	河北	0.3595
27		山西	0.3546	东北	辽宁	0.3547
28	西	贵州	0.3362	中	山西	0.3497
29		云南	0.3338	西	贵州	0.3421

根据表 5 可以看出,在经济生活领域,排名前四位的省份稳定在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浙江、上海,通过对比地区生产总值排名,2019 年和 2020 年两年,广东、江苏、浙江也始终排在全国前五位之列,说明这三个省份不仅在地区总体经济发展上较为富裕,也真正做到了“藏富于民”。而同在地区生产总值前五位之列的还有河南、山东,但通过测评结果可以发现,两省主要存在人均消费能力不足,城市化进程推动较缓、人均住房条件较差等问题,地区发展状况与人民经济实力不相符可能也与两省同为人口大省有关。尽管上海的地区生产总值仅处于中上游水平,但由于其居民消费能力突出,民众经济储备较为充裕、城市化发展水平高等突出优势,从而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水准。而在经济领域排名靠后的省份中,辽宁、甘肃、贵州始终位于后五位之行列。尽管这三个省份的整体地区生产总值也属于中下游水平,但辽宁、贵州的经济发展相对甘肃而言还是高出不少。具体来看,2019 年辽宁的就业形势相对较为严峻,根据梧桐果平台提供的 2020 届毕业生就业难度指数数据来看,辽宁也成为全国最难就业的省份^[35]。2020 年辽宁地区经济发展并未带来居民收入的有效提升,二者之间的差距较大,同时人均消费能力也较为不足,说明居民的经济储备较少。就贵州而言,连续两年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位于全国之末。而就全国水平来看,受疫情的持续影响,人民的整体经济生活水平有所回落。综上可以发现,只有经济的均衡发展才能带来人民经济生活的充实富裕。如果经济发展长板不突出,那么存在任何一项“致命短板”都会带来经济生活的增速滞后。

表5 2019年、2020年不同省份高品质生活一级指标排序表

排序	经济生活指标		政治生活指标		文体教育指标		社会生活指标		生态环境指标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1	广东 (0.6318)	江苏 (0.7394)	北京 (0.6505)	北京 (0.7579)	北京 (0.5419)	北京 (0.5283)	上海 (0.5698)	上海 (0.5905)	福建 (0.9329)	福建 (0.8740)
2	江苏 (0.6069)	浙江 (0.7226)	上海 (0.4257)	宁夏 (0.4693)	江苏 (0.5298)	陕西 (0.5277)	青海 (0.5539)	浙江 (0.5455)	云南 (0.8936)	云南 (0.8461)
3	浙江 (0.5844)	上海 (0.6102)	福建 (0.3990)	浙江 (0.4394)	浙江 (0.5191)	江苏 (0.4984)	山东 (0.5223)	北京 (0.5389)	广东 (0.8779)	江西 (0.8455)
4	上海 (0.5792)	广东 (0.6035)	四川 (0.3925)	上海 (0.4294)	福建 (0.4676)	浙江 (0.4959)	辽宁 (0.5181)	青海 (0.5272)	江西 (0.8652)	广东 (0.8245)
5	湖南 (0.5540)	福建 (0.5522)	宁夏 (0.3899)	青海 (0.4145)	陕西 (0.4656)	宁夏 (0.4555)	北京 (0.5103)	河北 (0.4734)	浙江 (0.8575)	浙江 (0.7931)
6	福建 (0.5504)	江西 (0.5492)	辽宁 (0.3877)	福建 (0.3903)	山东 (0.4420)	福建 (0.4551)	浙江 (0.5099)	天津 (0.4722)	四川 (0.8132)	广西 (0.7918)
7	江西 (0.5241)	北京 (0.5422)	浙江 (0.3819)	广东 (0.3855)	宁夏 (0.4213)	山东 (0.4461)	内蒙古 (0.4732)	广西 (0.4566)	贵州 (0.8096)	湖南 (0.7781)
8	吉林 (0.4930)	湖南 (0.5339)	河北 (0.3756)	甘肃 (0.3809)	广东 (0.3845)	天津 (0.4446)	河北 (0.4474)	黑龙江 (0.4450)	甘肃 (0.7733)	四川 (0.7600)
9	北京 (0.4887)	河南 (0.5199)	广东 (0.3565)	辽宁 (0.3807)	重庆 (0.3706)	江西 (0.3875)	广西 (0.4321)	山东 (0.4449)	湖南 (0.7691)	重庆 (0.7541)
10	安徽 (0.4856)	安徽 (0.4824)	山西 (0.3474)	陕西 (0.3784)	江西 (0.3693)	广东 (0.3796)	甘肃 (0.4309)	辽宁 (0.4358)	广西 (0.7640)	贵州 (0.7333)
11	湖北 (0.4724)	陕西 (0.4701)	陕西 (0.3422)	天津 (0.3781)	天津 (0.3682)	甘肃 (0.3582)	河南 (0.4206)	江苏 (0.4356)	青海 (0.7548)	甘肃 (0.7056)
12	山东 (0.4665)	湖北 (0.4634)	甘肃 (0.3392)	吉林 (0.3620)	河北 (0.3631)	黑龙江 (0.3407)	吉林 (0.4126)	山西 (0.4318)	宁夏 (0.7324)	青海 (0.6907)
13	青海 (0.4485)	青海 (0.4380)	吉林 (0.3364)	四川 (0.3367)	黑龙江 (0.3491)	湖北 (0.3247)	四川 (0.4060)	内蒙古 (0.4285)	上海 (0.7284)	湖北 (0.6833)
14	全国 (0.4477)	天津 (0.4359)	天津 (0.3206)	山西 (0.3105)	湖南 (0.3203)	河北 (0.2981)	江苏 (0.4039)	安徽 (0.4238)	重庆 (0.7258)	全国 (0.6536)
15	河北 (0.4420)	广西 (0.4257)	青海 (0.3052)	安徽 (0.3058)	辽宁 (0.3164)	河南 (0.2922)	重庆 (0.4024)	河南 (0.4136)	辽宁 (0.6629)	上海 (0.6457)
16	天津 (0.4392)	山东 (0.4192)	安徽 (0.2907)	山东 (0.2906)	山西 (0.3090)	青海 (0.2915)	黑龙江 (0.4018)	重庆 (0.4117)	北京 (0.6303)	吉林 (0.6355)
17	陕西 (0.4344)	全国 (0.3994)	云南 (0.2736)	重庆 (0.2859)	河南 (0.3039)	山西 (0.2813)	湖北 (0.4003)	湖北 (0.4061)	湖北 (0.5984)	宁夏 (0.6354)
18	河南 (0.4316)	四川 (0.3882)	山东 (0.2639)	江苏 (0.2859)	四川 (0.3018)	辽宁 (0.2751)	全国 (0.3944)	全国 (0.4033)	江苏 (0.5982)	江苏 (0.6201)
19	广西 (0.4304)	河北 (0.3880)	全国 (0.2475)	云南 (0.2809)	湖北 (0.2949)	安徽 (0.2643)	福建 (0.3907)	福建 (0.3950)	内蒙古 (0.5960)	内蒙古 (0.6138)
20	重庆 (0.4211)	内蒙古 (0.3836)	重庆 (0.2462)	全国 (0.2744)	青海 (0.2900)	吉林 (0.2478)	天津 (0.3902)	云南 (0.3626)	黑龙江 (0.5734)	安徽 (0.5936)
21	内蒙古 (0.3827)	黑龙江 (0.3753)	江苏 (0.2355)	河北 (0.2656)	甘肃 (0.2785)	重庆 (0.2351)	湖南 (0.3763)	甘肃 (0.3578)	安徽 (0.5728)	陕西 (0.5754)
22	山西 (0.3802)	重庆 (0.3683)	湖南 (0.2345)	贵州 (0.2454)	安徽 (0.2707)	内蒙古 (0.2336)	安徽 (0.3678)	湖南 (0.3523)	陕西 (0.5276)	辽宁 (0.5656)
23	黑龙江 (0.3514)	云南 (0.3629)	江西 (0.2288)	江西 (0.2401)	上海 (0.2573)	上海 (0.2333)	陕西 (0.3388)	吉林 (0.3523)	吉林 (0.4570)	黑龙江 (0.5203)
24	宁夏 (0.3374)	山西 (0.3593)	贵州 (0.2234)	黑龙江 (0.2348)	广西 (0.2512)	全国 (0.2281)	贵州 (0.3332)	陕西 (0.3359)	天津 (0.4247)	北京 (0.5026)
25	辽宁 (0.3303)	吉林 (0.3406)	广西 (0.2105)	广西 (0.2345)	吉林 (0.2481)	贵州 (0.2201)	宁夏 (0.3326)	江西 (0.3232)	全国 (0.4196)	河南 (0.3897)
26	甘肃 (0.3134)	甘肃 (0.3097)	河南 (0.1919)	湖南 (0.2268)	云南 (0.2344)	广西 (0.2074)	云南 (0.3317)	宁夏 (0.3200)	山西 (0.3997)	山西 (0.3537)
27	贵州 (0.2582)	宁夏 (0.3041)	湖北 (0.1869)	内蒙古 (0.2185)	全国 (0.2338)	四川 (0.1960)	广东 (0.3252)	广东 (0.3191)	河南 (0.3691)	天津 (0.3293)
28	四川 (0.2044)	贵州 (0.3009)	黑龙江 (0.1831)	湖北 (0.2088)	内蒙古 (0.2138)	湖南 (0.1821)	江西 (0.3252)	四川 (0.3040)	山东 (0.3416)	河北 (0.3259)
29	云南 (0.1880)	辽宁 (0.2683)	内蒙古 (0.1411)	河南 (0.1842)	贵州 (0.1985)	云南 (0.1394)	山西 (0.2998)	贵州 (0.2907)	河北 (0.2910)	山东 (0.3223)

在政治生活领域,北京蝉联榜首,政治生态环境良好,人民群众的参与度高,这也与北京的全国政治中心定位相匹配。除此以外,上海、宁夏也连续两年进入前五位行列,上海整体法制环境优异,每千人律师人数、公证人员数位于全国前列;宁夏每千人社会组织机构数排名靠前,可以说社会组织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重要力量,充分体现了宁夏公民对社会治理的民主参与度较高。需要特殊说明的是,青海在2020年首次进入全国前五位的行列主要凭借的是每千人调解人员数指标数值较高,由于2020年数据未公开,在评估时使用的是2021年的数据,因此会比同期全国其他省份发展稍好,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青海法治环境的良好基础与持续向好的动态趋势。因为除了青海外,天津、山东、内蒙古2020年指标的取值也由2021年数据替代,但并未因此进入排名前列。就政治生活发展水平而言,并未出现明显的地区分层发展现象,但较不发达的地区仍主要集中在中西部。

在文体教育领域,北京依旧蝉联榜首,这与北京获批全国文化、科技创新中心密不可分,具体来看北京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历史文化发展等均处于全国高水平行列。在排名前五位的省份里,江苏、浙江、陕西三个省份也属于全国公认的教育科技强省、文化名省。而全国平均水平的文体教育远落后于全国2/3的省份,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我国文体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较为突出,较优地区的发展水平远超较差地区,可以说教育科技是关乎地区发展的核心助推力之一,地区的向上发展反过来也会增加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从而进一步夯实地区教育科技能力。而文化生活更是助力公民精神品格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排名靠后的省份中,只有贵州连续两年进入倒五的行列,具体来看,贵州在基础教育领域发展严重滞后,义务教育巩固率位于全国末流,高等教育实力平平,根据全国第三方大学评价机构艾瑞深校友会网评估数据显示,贵州地区最好的高等教育院校贵州大学在2020年全国高校排名中仅位于第142名^[36],除此以外,贵州地区的整体科技发展也较缓慢。

在社会生活领域,上海连续两年位居榜首,突出表现为在社会服务、应急安全、公共卫生、交通便捷度和民众满意度领域的领先优势。在排名前五位之列,青海、北京也保持了两年的优势地位,尤其是青海在社会生活主观满意度方面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可见经济并不能成为唯一决定个体幸福感的因素,同时青海在公共交通领域的表现也较为突出,尽管青海暂未开通地铁,但其交通拥挤度较低、每千人享有的公路里程较高,这可能与青海整体人口数量较少有一定的关系。但在排名后五位的省份中,却均出现了广东的身影,具体来看,广东的社保财政支出、每千人社会工作者数量、公共卫生服务尤其是每千人社区卫生服务站数量和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每千人享有的公路里程、主观满意度尤其是对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均处于较低水平。

在生态环境领域,排名前五位的省份锁定在福建、广东、云南、江西、浙江之间,其中福建、云南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一、第二,而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则连续两年位居全国后五位之列。如果从南北差异来看,生态环境较优的省份多数集中在南方地区;如果从均值来看,生态环境的全国平均水平大幅提升,说明我国生态治理成效显著。

四、讨论与展望

从整体评估结果来看,排名靠前的省份情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浙江为突出代表的由各领域的均衡发展带来整体高品质生活建设的进步;另一类是以广东为突出代表的由部分领域长板效应所带来的整体水准提升。东部地区的发展仍在整体水平上普遍高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尤其是在经济生活领域表现最为突出,各领域排名靠后的省份集中在非东部地区。这一结果与部分学者的研究不谋而合,进一步说明经济增长是一个地区福利提升的基础和原动力^[37]。“高品质生活”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充分体现出时代的烙印。从学术研究角度出发,它根植于生活质量研究的土壤中,与传统社会指标研究一脉相承的同时更应包含具有创新性与探索性的指标,但这又与数据的可便利获取之间产生深刻的矛盾。同时,由于社会生活处在不断发展与变化之中,指标体系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当然这种变化也不是要推翻重来,而是应当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同步调整。例如,随着调查失业率数据的普及,将登记失业率指标替换为调查失业率指标,有助于增强指标体系对真实情况的精准映射,将养老床位数替换为护理床位数也符合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趋势等。

作为一项蕴含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指向的测度指标体系,如何从庞杂的各类指标中选取

最具代表性的一般指标,尽可能地还原公民对高品质生活的体验感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但无论指标体系构建得如何完美,数据的真实性与可获得性仍是检验指标体系是否有效的核心议题。在本研究搜集数据时,仍发现有部分省市的数据公开性较差,同一指标数据两三年间无任何变化,将约束性数据与预期性数据混为一谈等问题,这也为测量结果带来一定误差。总而言之,高品质生活测度指标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在未来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愿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参考文献

- [1] 赵笑蕾. 党的初心使命论的理论逻辑和政治优势[J]. 兰州学刊, 2022(1): 5-14.
- [2]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重庆代表团引起热烈反响——两个“生态”一起建 重整行装再出发[EB/OL]. (2018-03-12)[2021-11-01]. 中国经济网,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803/12/t20180312_28428125.shtml.
- [3] 杜玉华. 推动创造高品质生活[J]. 红旗文稿, 2021(18): 37-39.
-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EB/OL]. (2021-02-27)[2021-11-01]. 新华社,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2827885438559287&wfr=spider&for=pc>.
- [5] BRICKMAN P, CAMPBELL D T. Hedonic relativism and planning the good society[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1: 287-302.
- [6] 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89-125.
- [7] 黄蓓蓓, 熊火根, 朱喆. 马克思幸福观的超越之境和独特意蕴[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9(6): 82-84, +91.
- [8] 孙民. 论马克思幸福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向度[J]. 贵州社会科学, 2017(6): 25-31.
- [9] GALBRAITH J K. The affluent society[M]. New York: Mariner Books, 1998: 131.
- [10] 郑杭生, 李强, 李路路. 我国社会指标研究的几点探索[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7(2): 12-20.
- [11] ROSTOW W W. Politics and the stages of growth[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1-24.
- [12] ANDREWS M F, WITHEY S.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americans' perceptions of life quality[M]. New York: Springer US, 1976: 6-8.
- [13] 陆汉文. 生活质量研究的两种取向[J]. 西北人口, 2008(5): 8-11, +16.
- [14] 边燕燕. 城市高品质生活测度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0, 34(8): 45-57.
- [15] 邓嵘. 设计创造高品质生活[J]. 艺术百家, 2012, 28(6): 241-242.
- [16] 姚树洁. 怎样理解“创造高品质生活”[J]. 当代党员, 2018(11): 15-16.
- [17] 石凤珍, 王牡丹. 艺术融入社区: 高品质生活构建中的社区文化治理实践[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4(5): 10-13.
- [18] 徐国祥, 张正, 苏杰. 上海高品质生活测度指标体系研究[J]. 统计科学与实践, 2019(6): 9-13.
- [19] 杨皓然. 青海创造高品质生活现实路径选择[J]. 青海党的生活, 2018(11): 11-13.
- [20] 孟东方. 高品质生活的居民感知与创造路径——基于重庆市 39 个区县的调查分析[J]. 西部论坛, 2021, 31(3): 44-56.
- [21] 阎加林. 上海实现高品质生活的内涵、特征和实施路径[J]. 科学发展, 2020(1): 100-107.
- [22] 杜玉华. 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理论意涵、现实依据及行动路径[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1, 7(6): 98-106.
- [23] 盛毅. 建设具有成都特质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城市[J]. 先锋, 2020(12): 32-35.
- [24] STIGLITZ E J, SEN A, FITOUSSI P J. 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0: 72-100.
- [25] 席恒, 余澍. 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与推进路径[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2(2): 65-73.
- [26] 刘培林, 钱滔, 黄先海, 等. 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 管理世界, 2021, 37(8): 117-129.
- [27] 周文, 唐教成. 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2, 35(4): 5-14.
- [28] 程子非. OECD 国家打造高品质生活的经验及启示[J]. 社会政策研究, 2019(3): 90-100.
- [29] 庄丽兰, 许智闵. 衡量社会进步的工具——社会进步指数介绍[J]. 国土及公共治理季刊, 2015, 3(1): 43-56.
- [30] 上海发展改革研究院. 德国品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对上海的启示[EB/OL]. (2019-11-02)[2021-11-01]. https://www.sohu.com/a/351226280_100000139.
- [31] 2020 年中国民生发展指数部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EB/OL]. (2021-01-18)[2021-11-01]. 民生网, http://www.sohu.com/a/351226280_100000139.

www.msweekly.com/show.html? id=127099.

- [32] 张玉台,吴晓灵,韩俊,等.我国民生发展状况及民生主要诉求研究——“中国民生指数研究”综合报告[J].管理世界,2015(2):1-11.
- [33] 张建南.马克思幸福观的哲学维度及当代价值[J].贵州社会科学,2014(11):17-20.
- [34] 苗双双,冯建军.人民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核心[J].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2,5(1):3-12.
- [35] 2020届秋招季毕业生最难就业省份排名,东北独中三元[EB/OL].(2019-12-26)[2022-05-04].鲁网,https://www.sdnews.com.cn/news/gn/201912/t20191226_2657352.html.
- [36] 校友会2020中国大学排名1200强发布,北京大学连续13年夺魁[EB/OL].(2022-01-03)[2022-05-04].校友会网,http://www.chinaxy.com/2022index/news/news.jsp?information_id=709.
- [37] 袁艺,张文彬,焦兵.中国省域可持续经济福利测度及阈值效应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1,36(12):23-34.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Meaning, Index System and Inter Provincial Measurement of High-quality Life

LEI Xiao-kang, ZHANG Xiu-y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gh-quality lif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gnition of related concepts such as a good life, quality of life, and happy life, let alone from the main tone of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life should adapt to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 and the process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the people, and is a dynamic living state in which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such as income, employment, education, medical care, pension, housing and other objective conditions owned by citizens are more fully guaranteed, and subjective feelings such as happiness, sense of gain, and sense of security are more satisfied.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relevant indicator systems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izens' needs, taking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as the field division standard, the high-quality lif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re divided into 5 first-level indicators, 18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nd 49 third-level indicators such as economic life, political life, cultural and sports education life, social lif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finally form a "high-quality life index", covering objective reality and subjective feelings. The Delphi method an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re used to complete the assignment calculation of the index weight.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quality life in 28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al average, it is found that the areas with advanced high-quality life construction are still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life. Among them, the top eastern provinces are mainly composed of two types of situations, one is the progress of the overall high-quality life construc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fields represented by Zhejiang, and the other is the overall standard improvement brought about by the long-board effect in some fields represented by Guangdong as the prominent representativ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life construc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northeast China is uneven, which reflects that there are still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curr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n China.

Keywords: high-quality life; high-quality life index system; common prosperity

(责任编辑:高士荣)